



喜 话

晦 庵

北 京 出 版 社

书 話

庵 庵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印张：3 14/16·插页：2·字数：70,000
1962年6月第1版 196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统一书号：10071·607 定价：(7) 0.45元

序 言

我写《书話》，始于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結束，蛰居上海，有时披覽书籍，随手作些札記。最初給我以发表的光荣的是柯灵同志主編的《万象》。不久，柯灵同志被敌宪逮捕，感謝友情的支持，我从别人口里得到他間接带出来的消息，仓皇离家。一面以“王晦庵”名义，从龙华弄到一張“居住证”，一面又在寓所附近另外找个安身的地方，独自住了下来。剛剛开始的《书話》，就这样宣告中断了。

这一陣風声很緊張。留居上海的熟人，一个个决定分头出走。我的离寓暫避，目的也是为了等关系。长夏緩緩地消逝了。到八月，日本投降，大家离滬的計劃又紛紛打消。有一个时期，我因忙于別的工作，形成了与“书”无缘的局面，当然也无从“話”起。至于再次为《书話》执笔，則是出于《文汇报》編輯的敦促，他們指《万象》上的文章为例，約定每天一段，长短不拘。我于是又动起手来。其实发表的地方也不限于《文汇报》一家，先后登过《书話》的还有《联合晚报》以及杂志如《文艺复兴》、《文訊》、《时与文》……等。不过登載数量最多，時間最长的，还是《文汇报》。計算起来，大約写了一百篇光景。后来又突然中断了。这次中断也有一个为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內

幕。一九五六年，当《讀書月报》約我續写《书話》的时候，我曾在《開場白》里交代过。现在就把它摘录在下面：

……有一次，我的《书話》终于碰痛了一个大特务。他在汪伪时期担任过伪中央大学的教授，在上海开过旧书鋪。利用书店做他鬼鬼祟祟的工作。“八一五”以后，国民党官員“从天上飞过来，从地下钻出来”，到处“劫收”。这位“教授”兼书店老板搖身一变，居然成为紅极一时的“要人”。我在《书話》里揭破了他过去的历史。他派《中央日报》总主笔来找我，要我在《书話》原地更正。否則的話，他手下有三百名全副武装的“豪客”，随时随地可以枪毙我。人要活命，这是不錯的，可是人也要有能够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力量。我写的既然都是事实，事实又怎么能够更正呢？主笔劝我和他当面谈談。我想，我誠然閑得发慌，却还没有“吃讲茶”的工夫，便决定由他去。乱世人命，这一点我很懂得，只有坐以待“毙”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他终于没有执行这个枪毙的判決。倒是《文汇报》編輯爱惜我，从此就不再来逼我写《书話》了。天下可做的事正多，我也乐得趁此放下这副担子。……

《书話》在解放前就是这样結束的。解放后为《讀書月报》写的也不多，大約連載了三、四期，我又忙着去干别的什么了，剛开头就煞了尾。去年起重新执笔，則是登在《人民日报》最后一版上。当时曾經公开声明，没有时间不写，有时间写一批，陸續刊出。几个月来，或断或續，一共写了二十几篇。北京出版社要我編个集子，我觉得数量太少，旧稿又大都散佚，只能就手头剪存的部分选改十几段，合成四十篇。即使如此，它还

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册子。

中国古代有以評論为主的詩話、詞話、曲話，也有以文獻为主，专談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話》。《书話》綜合了上面这些特点，本来可以海闊天空，无所不談。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識，因此材料的記錄多于內容的評論，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紹。至于以后会写成什么样子，那是将来的事，不必在这里預告。說句老实话，我并没有把《书話》当作“大事业”，只是在工作余暇，抽一支烟，喝一盅茶，随手写点什么，作为調剂精神、恢复疲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也希望讀者只把它看做是一本“闲书”。当你們工作后需要休息的时候，拿来随便翻翻，如果居然能够从中看到一星有用的东西，那末，你們的任何一点收获同时也将是作者的收获。

至于文章的写法，我倒有过一些考虑。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話》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記，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語式的抒情。通过《书話》，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緒紛繁的事实用簡练的几笔表达出来。我現在可以向讀者坦白：我是一个和文字結了緣的人，不得不时时探索这些問題，《书話》是我的描紅本，它給我以鍛炼笔头的机会。十几年来，所以一直沒有放下《书話》的写作，这就是唯一的秘密。艺术无止境。自然，我的尝试是失敗的，这个小册子就是一个失敗的标本。有什么办法呢？虽然白髮偷偷地爬上两鬓，而我还在为自己的描紅本感到害臊。

晦 庵

一九六二年四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1
《守常全集》.....	1
《或外小說△》.....	4
科学小說.....	7
半农杂文.....	10
《撕碎了的旧梦》.....	14
《童心》.....	17
朱自清.....	20
走向坚实.....	23
乡土文学.....	25
革命者！革命者！	28
詩人朱湘.....	31
两本散文.....	33
駢肩作战.....	36
“怎样研究”丛书.....	39
《世界文化》第二期.....	41
翻版书.....	44
《子夜》翻印版.....	47
且說《春蚕》.....	50
再談翻版书.....	53
“有人翻印，功德无量”	56

革命的感情	60
郑振铎与《新社会》	63
《入道》	66
“取缔新思想”	68
关于禁书	71
关于禁书之二	75
关于禁书之三	78
书刊的伪装	81
“奉令停刊”	84
别开生面的斗争	87
若有其事的声明	90
在国外出版的书	93
《饶了她》	96
回忆里的故事	99
《药用植物及其他》	102
线装诗集	104
藏书印	107
藏书票	110
谈封面画	112
画册的装帧	115

《守常全集》

《李大釗選集》已經由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了。全書收作者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六年的論文、演說、雜文、講義等凡一百三十三篇，這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的人必須參閱的著作。從這裡，我們既可以看到作為初期共產主義者李大釗同志的主導思想，他的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的見解，也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各種思潮對他的影響。隨著歲月的推移，這種影響在後來的文章裡就逐漸縮小，逐漸趨向消滅。《選集》所提供的這條思想發展的綫索，和一九四九年七月北新書局印行的《守常文集》相比，看來要鮮明得多，豐富得多。我們的确可以從中得到很大的啟發。

大釗同志的文章散見於報章雜誌，生前沒有出過專集。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英勇就義，當時就曾計劃過為他編印選集，可是在那個社會裡，荊榛遍野，豺狼當道，又哪里容得了歡呼“新世紀”的聲音呢？一九三三年遇難六周年的時候，北京人民在地下黨的支持和領導下，發起為大釗同志募捐，並舉行公葬。《守常文集》的稿子也在這個時候編定。原稿分上下兩卷，收論文三十篇。魯迅先生寫過一篇《題記》，後來編入《南腔北調集》，文後加上一段短短的附識：

这一篇，是T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G书局出版。我諛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遣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C书局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識。

所谓G书局，就是为鲁迅先生出版《集外集》的群众图书公司。当时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不久，规定要审查原稿。鲁迅一开始就主张不将《守常文集》送审，不用书店的正式名义出版，印成后自由发卖，免得大钊同志的文章在“检查官”的笔下受刑。磋商未已，北京却有人放出空气，说是群众图书公司规模小，靠不住，这样的书应该委托大书店。一时颇有人随声附和。于是稿子便被转到了C书局——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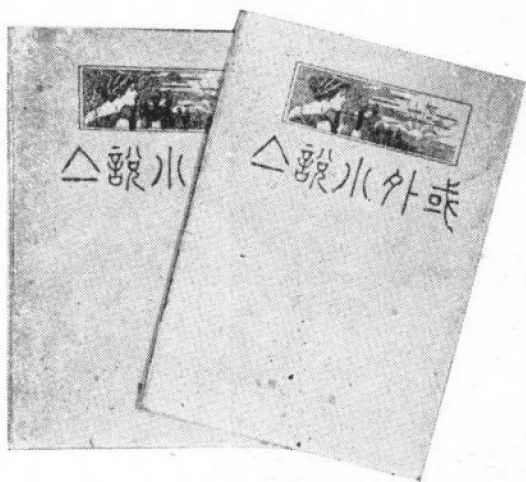
务印书馆。当时商务的当权者是王云五，书稿送审，奉“命”唯謹。一切都不出鲁迅之所料：出版的希望被扼杀了。索回的稿子留在北新书局编辑部。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大家又想起这个集子，为了避免牵涉旧案，乃改名《守常全集》，于一九三九年四月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由北新负责发行。可是书一露面，立刻又遭“租界”



当局的禁止，已經印成的都被沒收。十年以后，上海解放，所幸紙版无恙，才又恢复《守常文集》的名称，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印出一部分。重編《李大釗选集》的时候，旧刊散佚，搜集为难，有几篇就直接采自这一版的《文集》。至于《守常全集》，据我所知，外間十分少见。我曾保存一册，一九五九年秋北来，临行将原书連同别的一些文献，送给了正在筹备的上海革命博物館，算是让它有一个妥善的下落。严寒逝矣，春华蓬发，一切政治压迫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是連曾經有过《守常全集》的这件公案，似乎也不大有人知道了。

《或外小說△》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是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紀念。回想一九〇六年他从仙台回到東京，決計放棄醫學，從事善于改變人們精神的文艺活動，



到此恰好也是整整五十個年頭。那是他一生文學事業的起點。當時計劃的文學雜誌《新生》雖然沒有出版，但封面、插畫都已經選定了，原稿紙也印好了，準備刊登的文章也動手翻譯了，真是萬事齊備，只欠東風——一點支持的力量。但是這點力量終於沒有找到，《新生》只好告吹。直到一九〇九年，得到蔣抑卮的幫助，在東京出版了兩冊《域外小說集》，总算實現了《新生》的一部分計劃。這兩冊《域外小說集》，無論從魯迅的

文学事业来说，或者从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说，都是早期特别值得珍贵的文献。又因原书流行不多，几乎成了新文学中的“罕见书”，有资格放入新式黄堯圃的“百宋一廛”里去了。

东京版《域外小说集》封面青灰色，上首印长方形希腊图案，书名右起横排，作篆文“或外小说△”五字；下端标第几册。极优美。扉页右上角印有两行文字：《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会稽周氏兄弟纂译。也很别致。第一册出版于己酉二月十一日，第二册后四个月，于六月十一日印成。版权页上不记公历，当时公历还不很通行；也没有用宣统年号，则因留日学生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推翻帝制的运动，鲁迅是爱国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他在旧诗里说，“岂有豪情似旧时”，指的就是这时候的少年豪情，印起书来，当然不会用他所反对的“皇历”。书的发行人署本名：周树人；印刷者：长谷川辰二郎；印刷所：神田印刷所；总寄售处是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衡广昌隆綢庄，正是蒋抑卮开的铺子。

鲁迅收在《域外小说集》里的译文虽然只有三篇：安特来夫的《謾》、《默》，迦尔洵的《四日》。但《序言》、《略例》均出其手笔，版式书样，也都亲自厘订。序言云：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濤之微漚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

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很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抱負。那种切切实实，不自矜、不自餒的精神，正是魯迅一生所坚决奉行的。《略例》所談各点，亦肇后此主張之端，事虽小而信守勿渝。譬如他喜欢毛边书，自称“毛边党”，这在《域外小說集》就已经开始了：“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他喜欢每頁天地寬广，多留空白，《域外小說集》也正是这样实行的：“紙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訂定时亦不病隘陋。”卷末附录作者小傳及注釋，供閱讀时参考，后来編輯《譯文》杂志，仍然按此办法进行。凡有好的主張，一定坚持到底，真所謂数十年如一日。至于对各国人名通例，詳加解釋，連标点符号的用法，亦一一介紹，更可見开垦者筚路藍縷的苦心。

根据魯迅后来的回忆，《域外小說集》第一、二册在东京只卖出二十册，在上海也不过二十册左右。“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們的书和紙版，都連同化为灰烬；我們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从这个統計看来，东京版《域外小說集》流行于人間的，似乎只有四十部左右。但其实不止此数。魯迅每印一书，常好持贈知音，而蔣抑卮回国后，也曾托浙江省立图书馆大批捐贈，在卷首空頁上盖一印云：“浙江省立图书馆輔導組代紹兴蔣抑卮先生捐贈”。我曾从別的图书馆里看到。世有識者，当能珍重地保留着这部佳籍的吧。

一九二〇年，上海群众书社曾將一、二册《域外小說集》合排，重印出版，虽篇什增加，而书品則远不如前矣。

科学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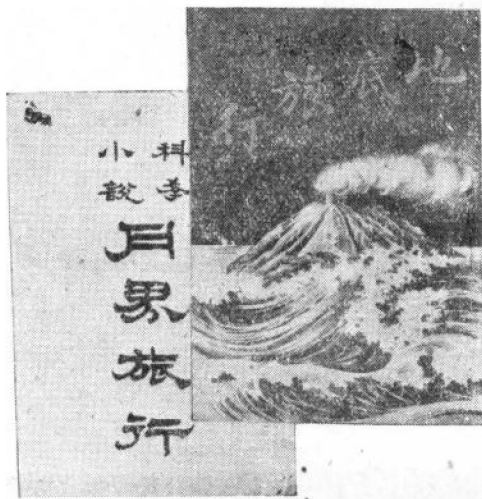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于一九五六年及一九五八年先后出版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島》，作者是法国的儒勒·凡尔納，他是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說家，所有作品，极受青年欢迎。《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島》統称为凡尔納的三部曲。他在作品里不但培育年輕人勇敢冒險的精神，而且灌輸了許多科学知識。凡尔納的著作和《江湖奇俠傳》、《五十年后之新世界》等不同，由于作者知識非常丰富，一切叙述都有科学根据，因此他的幻想往往成为极有趣的預言——科学世界的預言。

儒勒·凡尔納 (Jules Verne) 这个譯名根据的是法語发音，看起来有点陌生，其实他倒是最早被介紹到中国来的作家之一。一九〇二年，梁启超創辦《新小說》，从創刊号起，就登載了他的《海底旅行》，譯者为南海卢藉东，由东越紅溪生潤文。这也是当时的一种風气，一个人照譯原文，由另一个长于詞藻的人替他修改潤飾，发表时一同署名。儒勒·凡尔納的姓名当时被譯为“蕭魯士”，大概是根据英語发音譯了 Jules 一字，汉化了他的姓名。后来商务印书館的《說部丛书》也介紹过他，作者的姓名被譯成为“焦士威奴”，那却是两个字連

譯，但根据的仍然是英語发音。至于他的作品之所以为中国讀者熟悉，主要还是因为魯迅先生譯过他的两部作品，那就是：《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月界旅行》出版于一九〇三年十月，进化社版，当时采取卖稿的方式，所以只混称“中国教育普及社譯印”，沒有具上譯者的姓名。但原作者却被誤作美国培倫，序文里說：“培倫者，名查理士，美国碩儒也。”魯迅先生是从井上勤的日譯本重譯的，看来日譯本也是根据美国出版的英譯本重譯，所以把作者当作美国人；又因日本人念齿唇音的 V 为唇音的 B，把 Jules Verne 譯成为查理士·培倫，越来越像一个美国人的姓名了。井上勤的譯本分二十八章，魯迅縮成十四回。《地底旅行》出版于一九〇六年三月，凡十二回。曾在《浙江潮》杂志上发表，譯者署名之江索士，这是魯迅先生早期用过的笔名。后来由启新书局出版，三十二

开本，較《月界旅行》略小，彩色封面，形式和当时小說林社出版的书籍很相像。作者的譯名是“威男”，这是 Verne 的音譯，但籍貫又被誤成为英国，大概还是因为日譯根据的是英譯本的緣故吧。这样，



儒勒·凡尔纳在中国讀者的記憶里，就有了三个国籍，这是亟需为之訂正的。

凡尔纳生于一八二八年，歿于一九〇五年。如果根据我們今天的科学发明回过头去看一看看他的著作，有許多地方的确值得我們驚訝。同时，他的某些作品里反对人压迫人，提倡社会公道和人类正义的精神，也是使我們深深地为之感动的。清朝末年，許多人倡导西洋文明，但往往着重于猎奇和空想，所謂神秘小說、幻想小說、电术小說等等怪名称，充斥于出版界。一般人都把西洋末流作品，奉为珍宝。在这种蔚然成風的环境里，魯迅独能力排众議，披荆斬棘地选出凡尔纳的两部作品，介紹給迫切地需要科学知識的中国青年，这种眼力，也同样是值得我們傾倒，值得我們佩服的。

《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因为出版較早，在魯迅譯著单行本中，很不易得到。我寻找多年，一直沒有获睹庐山真面目。一九五四年冬，上海书商从浙江鎮海乡下覓得《月界旅行》一册，携来求售，索价奇昂，躊躇再四，終于还是把它买了下来。不久，上海魯迅紀念館也购得了《地底旅行》一册，为了使两书能够相映成輝，一九五六年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时，我就把这册《月界旅行》送給了新建的魯迅紀念館，使魯迅先生所譯的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能够同时展出，合成全璧，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心願。